

第一章 铜鼓的源流

一、铜鼓起源的争论

将铜鼓正放，整个形态犹如一个扁形的木腔皮鼓放置在一个圆筒形的基座上。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学者戈鹭波在越南北方少数民族地区曾看到木腔皮鼓就是这样被搁置在藤编的基座上的，因此，他推测铜鼓只不过是把革鼓和鼓座合铸在一起而已（《金属鼓的起源和传播》）。1961年，日本学者冈崎敬看了云南晋宁石寨山铜鼓以后，以同一古墓群出土的铜笙、铜笛是按照瓢笙、竹笛形象仿制为由，提出铜鼓也是模仿皮鼓制造的说法（《云南石寨山遗迹与铜鼓的问题》日本《史渊》第86辑，1962年12月）。

其实，这种认为铜鼓是仿自皮鼓的说法在中国早就有人提出。这种说法是他们从铜鼓的地理分布及其自然环境推演出来的。铜鼓分布地区纬度低，炎热多雨，土地卑湿，皮鼓在这种环境下容易受潮。皮鼓一受潮就会失去张力，声音变得低沉短促，木腔皮面也容易霉烂。为克服这种弊病，使皮鼓保持山鸣谷应的良好效果，在使用时，只好用火烘

烤 这样做 在指挥战阵时就比较困难。怎么办呢 按照一般人的推想，应当找一种不怕受潮的东西来替代。人类进入金属时代，懂得用铜和铜的合金制造器物。铜是不怕潮的 即使在雨地里敲击 同样会发出清脆的响声。人们知道铜的这个特性，于是就用铜来制造鼓面和鼓腔，而且将鼓面、鼓身和鼓座铸成一体 就成了铜鼓。根据这种推测 有的人甚至把首造铜鼓的功劳归到东汉马援名下，说是马援带兵南征时最先发现本腔皮鼓不适用于阴雨潮湿的环境，才造出铜鼓来的。

这种起源于皮鼓的说法，也被一些研究铜鼓的外国学者所接受。法国人 F·夏德在 1890 年所著的《北印度铜鼓》中 就主张铜鼓起源于木腔皮面的战鼓 并说这是公元 1 世纪中国用兵南方 遇到潮湿季节 战鼓损坏 主将便倡议造出铜鼓。有的人甚至认为，有的铜鼓上装饰的乳钉纹，是从皮鼓的钉头演化而来的。晚 妇女们都用木臼舂米 以便做饭。舂米习俗的地区基本上也是铜鼓分布的地区，铜鼓和木臼的使用方法和发出的声音也十分相似，因此他认为，越南国土上出现的第一批铜鼓可能起源于舂米习俗（《关于铜鼓起源的探讨》 越南《历史研究》1962 年第 42 期）这种说法看起来很新颖 但太离谱 他本人也没有多少把握 所以无人附和。

二、铜鼓的原始形态

铜鼓究竟是从什么东西演化来的呢？

人类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人们研究人类的进化是由近及远，不断往远古追溯的。探索铜鼓的始祖，也只能由近及远地往前追寻它们的原始形态。

研究铜鼓的学者，经过千辛万苦，搜集了大量的铜鼓资料，将这些铜鼓反复分类排比，分析其时代特征，然后一步一步往前推进，终于找到了铜鼓的老祖宗。

中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铜鼓的形态象倒过来放置的炊具或容器。《蜀中广记》引《游梁杂记》说：“诸葛鼓，其形圆，上宽而中束，下则敞口，大约若今楂斗之倒置也。”同书又引《戎州记》说：“铜鼓旁范八卦及四蟾蜍，状似覆盆”。近人曾瓶山的《铜鼓歌》曰：“腰间束缩腹底空，兀若坐墩宛覆釜”。正因为如此，在晚近还有人把铜鼓翻转过来倒放着当容器储存粮食杂物，甚至用作炊煮之器。也正因为早期铜鼓很像倒置的铜釜，荷兰、德国、英国的一些学者最初都不约而同地将铜鼓称之为“釜鼓”（Kettle Drum）。

1948年，法国学者莱维 P·Lery 正式提出铜鼓起源于炊具倒置的看法。他在印度支那人类学研究所所作的一个报告中，指出“在最古老的金属鼓与釜之间有许多形态

上的相似性”。他认为 如果将一个铜釜倒置 则其凸起的底部相当于铜鼓微凸的顶部 腹部相当于铜鼓的胸部 内收的颈部成为铜鼓的腰部，而外侈的唇部则正当铜鼓外侈的足部。但他没有提出具体证据（《第 I 类型铜鼓鼓式的起源》《越南人》1948 年第 2 期）。

50 年代初叶，云南省博物馆在金属回收部门拣选到一面形制古朴的铜鼓，这种铜鼓是以前没有见过的。在出版《云南省博物馆铜鼓图录》时 将这面铜鼓的照片和拓本印出 在文字说明中指出：“整个鼓的作风显得非常原始 很可能是甲式鼓中最早的一种形式。”1960 年 3 月 在云南楚雄县东北境内的大海波 因修小型水电站 在河沙层中挖出一面全无纹饰的铜鼓。这面铜鼓被带回昆明后，在云南省博物馆的入库登记卡上 开始填为“铜鼓”但因鼓面太小，足部很短，两对耳太细小，与以前的铜鼓不同，遂改填为“铜釜”但经仔细观察 发现还是象铜鼓 而且胸部有两处开孔 不能作炊具 故又改填为“铜鼓”。这面铜鼓被三易其名 说明它的形态处在铜鼓与铜釜之间 究竟是铜鼓还是铜釜，一时难以确定。

1964 年，在云南祥云县东南的大波那木椁铜棺墓中出土一面铜鼓 形体高瘦 鼓面有一个四芒的光体。和这面铜鼓一起出土的有一件铜釜 大口鼓腹 底小而平 翻转过来，和这面铜鼓十分相象。在发表这座墓葬的考古报告时，印

出了一张将铜釜倒置的照片，指出：“此釜形状和铜鼓十分近似，倒置过来看，其异于铜鼓者，只不过是打击面的直径较小，足边无折棱而已。过去，对铜鼓来源于何物，颇多揣测，迄无定论，此式釜之出现，又增添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线索”。类似大波那的铜鼓，以后在云南中部地区续有发现，至70年代，冯汉骥在《云南晋宁出土铜鼓研究》一文中明确指出：

从早期铜鼓的形制来看，它似乎是从一种实用器（铜釜）发展过来的。大概在云南地区的青铜器时代早期，曾使用过一种鼓腹深颈的铜釜，这种铜釜是炊器，又可将其翻转过来作为打击乐器。祥云大波那铜棺墓中这种形状的铜釜及铜鼓的发现，给了我们以明确的启示，说明了早期铜鼓的一些特别形状的来源，例如鼓面为什么较小，胴部为什么特别膨胀，鼓身为什么缩小，鼓足为什么又复行侈开，鼓耳为什么在胴部与鼓体之间，等等。这都是因为：鼓面原本是釜底，胴部原是釜腹，鼓身原是釜颈的延长，鼓足原是釜口，鼓耳原是釜腹与颈之间的釜耳。又因为整个铜鼓是从铜釜发展而来，所以打击面只有一面而非两面。

1975年，云南楚雄县城东南约3.5公里的万家坝，因该县良种场搞农田基本建设发现一群古墓，云南省博物馆的考古工作者从其中一座大墓的腰坑中挖出1面铜钲、3件铜釜、6件铜羊角钮钟和100多件其他青铜器，其中有一

件铜釜是用铜鼓改制而成的；将铜鼓翻转过来，在鼓足边上加铸一对辫索形耳就成了铜釜。同年 10 月在同一墓地的 23 号墓的棺底垫木之下挖出 4 面铜鼓、大量青铜工具和兵器。这 4 面铜鼓的外表都很粗糙，鼓面小，胸部特别突出，腰细而长，足短而向外侈。这些铜鼓的外壁都没有花纹，但内壁有花纹，推测原来是足部朝天倒放着使用的。因为只有倒放，内壁的花纹才能看得见。这些铜鼓出土时也确实是倒放着的，和那些铜釜放置的形态完全一致。鼓面上有烟熏痕迹，也说明它们确曾作炊具用过。这就更证实了铜鼓来源于铜釜的推断。

一次又一次的发现，使铜鼓研究家们产生一系列联想。万家坝的发掘简报《文物》1978 年第 10 期 10 页)指出：

万家坝所出铜鼓，是迄今为止我国经科学发掘所获铜鼓中之最原始者。这批铜鼓器身似釜，而且大部分鼓表面有烟痕，明显曾作炊爨之用；与此同时，有的釜又是利用铜鼓改制的如 M1: 1。这些都足以证明本地的铜鼓不但是从釜发展而来，而且尚停留在乐器、炊器分工不十分严格的初期阶段。这对于解决铜鼓产生的时代、地点以及追溯其发展的源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铜鼓是铜釜演变而来的 万家坝铜鼓与铜釜共出 酷似铜釜，是最原始的铜鼓。这个结论逐渐为大家所接受，汪宁

生《试论中国古代铜鼓》把这类铜鼓单独列为一类 作为 A 型 《考古学报》1978 年第 2 期)李伟卿《中国南方铜鼓的分类和断代》把它列为 I 型 A 式 《考古》1979 年第 1 期)。1980 年 4 月,在中国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上正式命名为万家坝型铜鼓。

但是,仅仅说铜鼓起源于铜釜还不完全确切。因为早期铜鼓与铜釜常常共存于青铜文化的墓葬中,目前还很难找到一处遗址或墓葬只出铜釜而不出铜鼓,不足以说明铜釜是铜鼓的原始形态。有的学者认为,楚雄万家坝出土的 5 面铜鼓严格说起来并非专门乐器,从它们底部有烟炆,花纹在内壁,以及圈足向上的情况看,应该是一种炊具兼乐器,而以炊具功能为主的器物,是铜釜和铜鼓的同共祖型,与其称之为“釜形鼓”还不如称之为“鼓形釜”。因此他们主张,不能笼统地说铜鼓起源于铜釜,而应该说铜鼓和铜釜共同起源于“鼓形釜”。鼓形釜的前身则是当地民族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使用的双耳鼓腹陶罐。有的学者同意铜鼓起源于炊具陶器,但不以双耳鼓腹陶罐为然,而主张是鼓形陶釜。这种鼓形陶釜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应该是原始铜鼓和铜釜的祖型。

奥地利学者黑格尔将铜鼓划为 4 个基本类型和 3 个过渡类型,以越南的沱江鼓(即慕列鼓)和中国的开化鼓等列为第 1 类型 认为是铜鼓的最早形式 其它类型铜鼓都是由

这一类型的铜鼓发展而来的。万家坝型铜鼓的发现，突破了黑格尔的分类范围，黑格尔的 4 个基本类型和 3 个过渡类型已无法将其包容。而且，万家坝铜鼓的形制明显地早于黑格尔分类的第 I 式铜鼓，所以有的学者称这类铜鼓为“先黑格尔 I 式”。

“先黑格尔 I 式”铜鼓的命名是由日本学者今村启尔提出来的。1968 年，日本学者松本信广在《古代印度支那稻作民宗教思想之研究—通过古铜鼓纹饰所见》一文中，便推断在黑格尔 I 式铜鼓之前还存在一种更古老的铜鼓。1973 年今村启尔在《古式铜鼓的变迁和起源》一文中对中国南方及东南亚铜鼓进行了分类和断代，把越南北方的助波鼓和云南西部的大波那鼓假定为先黑格尔 I 式的类型，并且说：“铜鼓在老挝鼓、纳尔逊鼓之前即黑格尔 I 式以前，就有着很长的发展时期，是从某些青铜制的容器（锅是有力的候补）分化出来。”1979 年今村启尔在《东京大学考古学研究室研究纪要》上发表《关于先 I 式铜鼓》首次正式提出所谓“先黑格尔 I 式铜鼓”的命题，他列举了 13 面先黑格尔 I 式铜鼓，其中包括我们已经提到的大海波鼓、大波那鼓、万家坝 1 号墓鼓、万家坝 23 号墓的 4 鼓，此外还有万家坝 1 号墓已改制成铜釜的那面鼓、云南省博物馆藏的 3 面鼓、越南的松林鼓和泰国东北部出土的一面鼓。1980 年近森正、市原常夫撰《西江、红河流域铜鼓的分布》一

文，提到这种分类也把越南的松林鼓和云南的 10 面早期鼓列为先黑格尔 I 式铜鼓。1985 年 10 月日本鹿儿岛大学新田荣治在该校《史录》第 13 号上发表一篇题为《云南、北越、泰国发现的先黑格尔 I 式铜鼓》一文，详细地论述了先黑格尔 I 式铜鼓学说。他归纳先黑格尔 I 式铜鼓的主要特征是鼓身明显地分为上、中、下三段，上段胸部较大，胸部直径大于鼓面直径，下段（足部）短小，胸部与腰部间的边缘上通常有二对耳，鼓体几乎无纹饰，有的鼓内壁有纹饰。

由此可见，中国学者所指的万家坝型铜鼓就是日本学者所说的“先黑格尔 I 式铜鼓”。这类铜鼓是大家公认的最原始的铜鼓。

三、铜鼓的起源地区

在没有找到原始铜鼓之前，关于铜鼓从那里发祥也展开过许多讨论。铜鼓起源于何物，直接关系到铜鼓起源于何地。皮鼓说当然从中原内地找其发源地，象脚鼓说只能在西南边疆地区找其发源地，木臼说只着眼于越南北部，铜釜说都立足于云南中部地区。此外，铜鼓起源地还有印度说、柬埔寨说等等。

主张铜鼓是从皮鼓演变而来的人，当然都是从中国内

地去找源流，认为皮鼓传到南方多雨地区，因气候不适应，才用铜仿造，同时把创制铜鼓之功归之于马援或诸葛亮。

南宋范成大说过一句铜鼓为“伏波所遗”的话，后人就以此为蓝本编造出马援造铜鼓的许多传说。如南宋《舆地纪胜》卷一六邕州条说：“铜鼓马援所制”。《大明一统志》曰：“武宣县西十里，亦有铜鼓滩，或谓马援铸铜鼓于此。”明代以后，在马援造铜鼓的传说以外，又增加了诸葛亮创造铜鼓的传说。朱国桢《涌幢小品》就说：“蛮中诸葛铜鼓，必诸葛倡之，后人仿式而造”。《明史·刘显传》也说：“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西清古鉴》在著录铜鼓时也说：“今世多谓之诸葛鼓，盖武侯渡泸后所铸。”连大金石学家朱彝尊也认为：“伏波将军平交趾，诸葛丞相渡泸，始铸铜为鼓”。所以清人戴朱弦的《铜鼓歌》就说：“蛮溪雾毒苍虬舞，土夫架阁悬铜鼓，问是当年谁所留，尽说传自汉武侯。”

后来西方一些学者也沿用这些说法，认为铜鼓是马援和诸葛亮创造的。戈鹭波在《铜鼓的起源和传播》一文中主张越南的铜鼓为马援南征以后移居该地的汉人制作的。

正是因为如此，在广东、广西的伏波庙中，在中南、西南广大地区的武侯祠里，总有铜鼓陈列着，把它们作为马援或诸葛亮的遗物，让人们顶礼膜拜。正如清人郑定《伏波祠怀古》所述：

荒祠衰草已凄然，犹有居人话昔年。

铜鼓苔生秋雨后 石墙花落夕阳边。

但是这些传说是与历史真实相违背的，文献已清楚地记载 早在马援之前 铜鼓已经出现并发展成熟，《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南征‘得骆越铜鼓乃铸马式’并不是说马援铸骆越铜鼓。说明在马援之前，交趾地区的骆越就有铜鼓了。正因为交趾已有铜鼓，马援入交趾才有铜鼓可得，并将得来的铜鼓熔化后铸成他的马式。既然马援之前已有铜鼓 更不用说等到比他晚 200 年的诸葛亮去创制了。关于这一点中外学者早已指出。比范成大稍晚的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按《广州记》云 俚僚铸铜为鼓 唯以高大为贵 面阔丈余。不知所铸果在何时 按马援征交趾 得骆越铜鼓铸为马，或谓铜鼓铸在西京以前，此虽非三代彝器 谓铸当三代时可也。”清代学者谢启昆在《粤西金石略》中指出：“自石湖 即范成大 有‘伏波所遗’一语 后人遂误为伏波所制 且因伏波附会于诸葛 至谓大者为伏波鼓 小者为诸葛鼓 真误中之误矣。”张祥河在《粤西笔述》中也说：“马援既得铜鼓铸为马式 若以鼓为援所制 何以自铸而自销之？其非援物可知。铜鼓出于诸葛武侯未生之前，以为孔明所制 亦属附会。”檀萃《滇海虞衡志》也说：“铜鼓 粵人以为伏波 滇人以为诸葛 而实蛮之自自铸也。”所以黄春谷在《梦陔堂诗集》载《铜鼓歌》同戴朱弦唱反调：“漫说南征如巧制 非关伏波美骆越。”日本学者松崎复在

《谦堂遗文》中也说出了同样的道理。

前节已经论及，从铜鼓本身，也确实找不到来源于皮鼓的痕迹。中国内地发源说是不成立的。

西方学者研究铜鼓，是很注意追溯它的发源地的。德国学者迈尔和富瓦在 1897 年出版的《东南亚的铜鼓》中提出铜鼓起源于柬埔寨沿海地区的说法，他们的根据只是印度尼西亚塞卢发现的 4 面铜鼓，鼓身上有象和孔雀形象的图样，但并无其他证据，这种推论就是在当时也是很轻率的。事实已经证明，柬埔寨发现铜鼓的数量很少，而且时代都是偏晚的，没有早期铜鼓，绝无发源地的可能。在中国，因为《新唐书·礼乐志》说过：“天竺伎有铜鼓”马端临《文献通考》也说“大铜鼓”出于南蛮天竺之国”小铜鼓“唐乐图所传天竺部用之”。有人就主张铜鼓发源于印度。近人梁帖庐《铜鼓渊源》甚至将铜鼓上的卍纹同佛经上的梵文联系起来，把它作为铜鼓是从印度传来的根据。其实，这些有卍纹的铜鼓不是早期铜鼓，而是 11 世纪以后的铜鼓。把天竺国简单理解为印度也是一种误会。徐松石在《粤江流域人民史》一书中已指出，古籍所载出铜鼓的“南蛮天竺之国”实际上是指中国云南西部和南部，并非今日的印度。

《云南备征》载《云南纪游》说“大理即古时天竺妙香国。这与后来铜鼓发现的事实是相合的。地处南亚的印度，不但历史上不曾创造过铜鼓，就是直到现在为止，也从未发现过

古代铜鼓，根本就在铜鼓的分布地域之外，当然谈不上是发源地。

铜鼓起源于印度说，柬埔寨说，由于与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不符，已为中外学者共同抛弃。至于奥地利学者海涅·革尔登主张铜鼓连同所属的青铜文化导源于欧洲之说，更是无稽之谈，几乎从来就没有人附和。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还是出土铜鼓集中而年代又偏早的地区，无非是云南中部、越南北部、广西东南部这 3 大块。

1901 年，格罗特在《东印度群岛和东南亚大陆的古代铜鼓》一文中主张铜鼓为中国西南蛮人的创制。1902 年，F·黑格尔出版《东南亚古代金属鼓》一书时，没有具体指出铜鼓的起源地，但他认为，铜鼓应产生于巨川大河流域，而不是滨海地区。后来，由于越南东山文化中发现一批铜鼓，学者们便把注意力集中到印度支那半岛。

铜鼓起源于越南北部说是本世纪初西方学者提出来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所获的铜鼓资料多来自越南，对中国早期铜鼓了解甚少，以为越南出土的玉缕铜鼓是最古的类型，其他各地的铜鼓都是从这类铜鼓发展而来的。后来越南的部分学者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发挥，认为越南是铜鼓的发源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考古工作者在云南、贵州、广西等地先后发现了大量的早期铜鼓，极大地丰富了铜鼓研究的内容。其中云南楚雄、祥云、

弥渡、昌宁等地出土的铜鼓形制古朴，是全新的资料。这些铜鼓大部分是科学发掘品，有大量共存物可资断代，加上碳素年代测定，时代是可靠的。黑格尔确定铜鼓分类时，还没有见过这么古朴的铜鼓。这些铜鼓的发现，已突破了以前的分类系统，日本学者今村启尔把这些新发现的铜鼓称之为“先黑格尔 I 式”。越南部分学者认为，时代早的铜鼓是越南的玉缕鼓、黄夏鼓、沱江鼓和从中国云南传出的开化鼓。然而这些铜鼓大都胸部较高 形体较大 结构稳定 面、胸、腰均有各种图案花纹 主题图象有房屋、舞乐、羽人、竞渡等内容，工艺水平很高，远非铜鼓的原始形态所能有。这些铜鼓不但比上述云南中部偏西地区发现的铜鼓进步，甚至比云南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曲靖八塔台、贵州赫章可乐、广西田东锅盖岭、西林普驮屯、贵县罗泊湾等战国至西汉时期墓葬出土的铜鼓还要进步，应是比较成熟和晚出的作品。越南一些学者也认为 要制成玉缕、黄夏、沱江、开化那样精美的铜鼓，需要经过许多世纪的经验积累，在这些铜鼓之前，必然另有一些开创期的铜鼓，但这种开创期的铜鼓在越南本土上还没有找到。越南北方的红河流域确曾有发达的青铜文化，但一直到门丘期，也只能铸造出个人使用的工具和装饰物等小件青铜器，没有发现大件的青铜容器。当地的铸造技术还停留在以砂石范为主的阶段，还没有掌握泥型铸造法，不具备铸造大型青铜容器的技术条件。只

有到了东山期，才出现上述所说的那种精美的铜鼓。因此，说越南北部是铜鼓的起源地，证据不足。

广西南东和广东西南连接的地带是东北—西南走向的云开大山，岗峦起伏，森林密布，也是铜鼓发现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个地区的铜鼓有别于云南和越南，自成一个体系，有一定的地域性，有人认为它是土生长的，推论这个地区也是铜鼓的发源地之一，而另一些学者认为，这个系统的铜鼓是滇系铜鼓东传与北方来的汉文化融合的结果，只是滇系铜鼓的歧出类型而已。这个系统的铜鼓多是分散埋藏的，出土资料十分零碎，目前还没有见从古墓中出土的。由于共存情况不明，断定其时代还比较困难，上述两种推断都缺乏坚实的时代根据。但看得出来，这个地区的铜鼓是大起大落的，发生得较迟，来势汹涌，一出现就是形体硕大，纹饰繁杂，铸造技术精良的铜鼓，消失得也快，一进入唐代后期就去向不明。究明其来龙去脉还是铜鼓研究中的一大难题。

铜鼓起源地应从发现早期铜鼓较多，而且青铜冶铸技术又足以能铸造铜鼓的地区去寻找。云南中部地区正好具备这些条件。

云南中部，云贵高原被许多呈折扇状分布的河流切割成平顶的高山和陡峭的河谷。丘陵和盆地交错并存，蕴藏着丰富的矿藏和水力资源。在这块地方，很早就有人类生

活 在距今 3100 年前的剑川海门口铜石并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开采铜矿和使用铜器。从楚雄、祥云古墓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滇池地区开始使用铜器的时间很早，到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发达的青铜文化，这种青铜文化所具有的青铜冶铸业足以铸造出巨大而复杂的铜棺和容器，为铸造铜鼓创造了必备的技术条件。铸造铜鼓需要有大量的青铜原料，从《汉书·地理志》记载可知 云南中部的江川、玉溪出铜，通海、河西、个旧、蒙自、峨山出锡 在西汉以前就已著名 楚雄万家坝一批西周至春秋时代墓葬，既出了铜鼓，又出了铜釜，已获得铜鼓起源于铜釜的直接证据。这个时代，大致相当于越南青铜文化的门丘期，反映出来的铸铜技术却比门丘期高超，具备了使用陶范铸造较大型容器的能力，这种铸造技术是创造铜鼓的必要前提。另外，从目前发现铜鼓的情况来看，原始形态的铜鼓都集中发现于云南中部偏西地区 如楚雄、弥渡、祥云、昌宁等好几个县 在这个地区以外，很少发现过这么古老的铜鼓。这种早期铜鼓往后发展，就是石寨山型铜鼓。云南中部地区出土的铜鼓从早期到晚期可以排成队列，自成系统，发展脉络清晰。而原始类型铜鼓又从当地出土的铜釜、陶釜的形态上可以找到渊源关系，证明它们完全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由此可见，铜鼓最初发生于云南。

铜鼓起源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目前的研究成果能达

到这一步，是中外学者经过长期努力的结果。随着新的资料的不断涌现和新的研究手段的不断提高，有关结论亦将更具体化和明朗化。

四、铜鼓的分布地域

铜鼓的使用和流传，同古代民族的迁徙和文化交流息息相关。凡是有使用铜鼓的民族生活过的地方，都会留下铜鼓的踪迹。

在中国，铜鼓主要分布于岭南和西南地区各省，包括广东、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重庆、湖南，但不以今天的省界为限。

广东，从文献记载铜鼓地名和出土铜鼓地点来看，铜鼓主要分布在北江以西地区，包括韶关、肇庆、佛山、湛江地区。湛江地区是出土铜鼓最多的地区，几乎每个县市都有铜鼓发现，其中尤以与广西毗邻的廉江、高州、信宜一带出土的最多，仅1950年以来就出土铜鼓五六十面。其他如徐闻、海康、化州、茂名、阳江、阳春等县、市也都有铜鼓出土。肇庆地区的罗定、云浮、高要、广宁、德庆和郁南，都有铜鼓出土。佛山地区和韶关地区偏于铜鼓分布地区的东侧，除南海县有铜鼓出土以外，中山、开平、台山、高鹤、乐昌、曲江、连山、清远、佛冈等地目前只有铜鼓地名，没有发现过铜